



胡漢民著

國民黨民衆運動
理論

中央政治會議
武漢分會

宣傳叢書第四種

十七年十二月印行

中央政治會議武漢分會

宣傳叢書第四種

圖書館
蘇工業學院
章
藏

胡漢民著

國民黨民衆運動的理論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印行

國民黨民衆運動的理論

胡漢民

一 一般的觀察

民衆運動，在中國已由多年實際的試驗時期進到理論的確立時期。經過多年試驗的行程當中，我們應該把民衆運動一般現象作一個總觀察，從觀察當中，佔定它的內容和價值。

先就它的一般現象說，我們知道凡是民衆運動，其起因總是由於社會的大變或國家的危亡。民族間戰爭的失敗，外人的欺凌屠殺，軍閥官僚的賣國殃民，少數特權者的荼毒壓迫，都是直接製造民衆運動的原料。沒有這種原料，民衆運動的火燄是燃燒不起來的，縱然燒也不長久，也不普遍。在中國，軍閥的迭起，帝國主義者的相繼掠奪，繼續供給我們民衆以運動的燃料，而我們的民衆運動因之也有備具永久性的可能。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點。民衆運動是最富於狂熱性的，其所感受的刺激大，其所發的刺激亦大。巨風怒雨，固然發了天地間不平之氣，然狂暴的傾向，也隨着而來。所以凡是個人批評的理性，一到羣衆的狂熱裏面，

就最不容易表現，而反常的行動，往往隨狂熱與俱進。這種民衆運動的現象，便引起了世人兩種的批評：一種認定民衆運動是最富危險性的，是不應該有的；一種認定民衆運動是最有力量的，最能促進社會的改造的：前者是法國心理學家呂邦的態度；後者是革命者的態度。但是社會不能免避罪惡，不能保證不遭受危險，則民衆運動自不能保其不發生。所以問題並不在民衆運動是否應該有，而在如何使民衆運動成爲有益於社會生存的利器。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點。民衆運動，結果往往歸於失敗，歷史上這種例很不少，而且失敗的結果，往往引起社會民氣若干時的消沉。究其失敗的原因，不外幾種。如果是由於目標太多，或問題太複雜，則民衆到了認清一個總的最大目標，或找出許多問題的一個中心問題時候，還會運動起來。如果失敗是由於民衆運動當中起了野心家，那末民衆不久必將轉移他們的目標，向着野心家拊擊。如果失敗的原因，在於敵方的壓迫太強大，那末民衆勢力一時屈服，不久必將再起，而且再起的力量必將更大。假使失敗的原因，由於思想錯誤，方向歧謬，則民衆因失敗而受的教訓和覺悟，比什麼教育制度所生的效果還要更大而更敏捷。這是應該注意的第三點。

依第一點說，民衆運動是挽救國家危亡和保障社會生存的一個力量，是應該

鼓勵的。依第二點說，民衆運動便有何始可使之成爲有益於社會的問題。依第三點說，民衆運動，失敗和成功，都於社會有很大的影響，而我們的問題，便是要如何纔能使它成功多於失敗，及如何使它好影響多於惡影響。總括地說，民衆運動一定是以救國救社會爲目的；要保證它的成功和好影響，自然要有必具的條件。這些條件當中，第一須有不拐騙民衆的忠實領導；第二須有強固的組織；第三須有共同的信仰。這三個重要條件完備了，民衆運動纔有不可搖撼的基礎和不可抵抗的力量。

這幾年來，在民衆運動當中奮鬥的，表面上都是一個國民黨，而暗地裏冒國民黨招牌做非國民黨工作的，却有一個共產黨，或不僅是共產黨。這種現象，便是拐騙民衆的第一義；因爲掛羊頭而賣狗肉，主義上政策上也就隨着換了內容，便是信仰上起了裂痕，這是拐騙民衆的第二義；信仰被搗亂，招牌被假冒，組織上也自然生出許多衝突而矛盾的系統，這就是拐騙民衆甚至拆散民衆的第三義。共產黨拐騙民衆的罪惡，我不要再在這裏細數，我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依這三種事實的綱領，可以更指示出一個原則來，就是：凡是民衆運動，只能以一個黨爲中心，只能以一個信仰爲目的，而且只能以一個黨一個信仰爲力量的總發動機。

所謂一個信仰，須得要基於民衆相互利益的總信仰；所謂一個黨，須得要以民衆相互利益的總信仰爲努力的總目標。信仰統一，民衆相互利益就要由黨來企求；黨的組織統一，民衆一切組織就要以黨爲中心，而一切活動就要由黨出發，一切政策由黨透過，一切工作由黨分配。更深切地說：民衆運動，沒有以全體的利益爲歸宿的主義便沒有精神；沒有全體對於主義的信仰，便沒有組織的可能性，沒有組織可能性，便沒有力量。必須拿得定主義，固執着信仰，集中在一個黨的組織裏而，然後民衆運動就可以把國家的權力和社會的權力打成一氣，把國家的政治機關和社會的公衆機關連成一個脈脈相通的血流；必如此，民衆運動纔可以成爲改造國家和社會的偉力，纔可以成爲處在次殖民地苦境的中國的生力軍。

依前述的原則而批評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可得許多極有興味的觀察，而且此種觀察，很可爲前述各原則的印證。第一，共產黨的主義是不敢告人的，而不敢告人的證明，就在於假借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名義向民衆接觸；反面的說法，就是共產黨若不冒國民黨的招牌，便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得民衆的信任；共產黨沒有東西，就是拿不出真實以全體民衆利益爲歸宿的主義來，沒有真正以全體民衆利益爲歸宿的主義，而冒他人的黨和主義以騙取民衆，其原因乃在共產黨另有其

不可示人的鬼胎，而視民衆爲其鬼胎的工具。第二，共產黨是主義的寡情者，而是策略的迷信者；她也曉得民衆運動是起於國家社會之發生大病症，然而牠却犯着主觀病，其主觀病的沉重，乃至不問國家社會所生的是什麼病症，不求引導民衆把病症救治完好，而只一味的施用策略以造亂：國家是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牠却要引帝國主義來壓迫得更甚；社會是已陷落在貧困瓦解的境地，牠却要引社會由貧困瓦解之境而趨於破產流離之境，由破產流離之境而趨於自相殘殺以至於滅亡。第三，共產黨以爲有亂子，就能激得動民衆，引民衆趨向搗亂就能革命，這樣就符合於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了，殊不知牠在事實上做起來，牠的兩大對壘的階級鬥爭，便要成爲同一階級分裂爲多少職業，同一職業分裂爲多少派別，同一派別分裂爲多少小組，同一小組分裂爲多少個人，分裂愈多，鬥爭愈多；天下哪有把全個人類全個民族分析到極點，鬥爭到極點，而可以說這是爲人類爲民族爲個人謀得幸福的革命方法呢？所以共產黨在中國活動起來，牠不但不能做兩大階級團結的鬥爭運動，並且不能做團結中國民族和帝國主義鬥爭的運動：前者是證明其不能作馬克思理想中的階級鬥爭；後者是證明其不能作中國所需要的國民革命運動；二者都不能，牠還作什麼民衆運動呢？第四，證以過去的事實，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在軍閥統治之區，却沒有做着破壞工作，而在軍閥已被顛覆之區，倒盡量襲用俄國共產黨的破壞方式，這足見客觀的環境需要破壞的，牠倒不破壞，而不需要破壞的，牠却破壞到民不聊生；且因此而知共產黨所用的唯物史觀，並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乃是廣東俗話所謂『勢利』觀，——軍閥對牠不留餘地，牠倒柔順得很，國民革命軍所到之區給牠活動，牠倒搗亂起來，——結果就是需要解放的民衆却不解放，已經解放的民衆倒又被牠做了試驗品，而受盡不能忍受的苦痛，這只是叫民衆掘自己的墳墓，何嘗是爲民衆開幸福的新路？照第一個批評，共產黨是拐騙民衆的。照第二個批評，牠是施策略，將民衆做工具，還以之戕賊民衆而滅亡社會的。因爲害民衆，害社會，所以歸到第三個批評，牠不能作階級鬥爭，就是連農工運動也不能作；他不能作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就是連國民革命也不能作。何況牠把社會國家弄到破產大亂的時候，適足爲軍閥及帝國主義造機會，所以歸到第四個批評，牠的民衆運動，只可說是民衆掘自己墳墓的運動！

經過共產黨的試驗，中國革命的民衆，應該到了覺悟而轉向共產黨拮据的時期。這兩年之間，中國民衆經驗了自來未曾有過的經驗，受了自來未曾受過的教

訓，如果依照殘忍的唯物史觀的說法，這許是中國民族不可忘記的教訓，然而犧牲也太大了。再檢點民衆運動的成績，可以說完全失敗。經過重大的犧牲，精神上所得的只有痛苦，物質上是毫無成績，中國民氣，目前遂有回復到從前不緊張的那樣傾向。然而共產黨，軍閥，帝國主義，中國民族生存上這三大惡魔，都正在醞釀着新形勢，計畫着壓迫中國和破壞中國的新方式，我們中國民衆是決不容鬆懈下去的。我敢堅決地說，這三大惡勢力不打破，中國民衆便一日不能不集合在三民主義之下作普遍的團結和奮鬥。三民主義本來不只是消極的爲打破這三大惡勢力而設，只是事實上正遇着這三大惡勢力的存在而猖獗，那就證明三民主義越發是打破這三大惡勢力的唯一利器。這不是誇口的說法，歷史的行程是決不會欺人的，大家且耐着心兒看吧。

二 舍三民主義外無民衆運動的理論

何以三民主義必定是中國民衆運動的基礎呢？這問題有兩種答案：一是從中國實際的需要上來的；一是從各國歷史的教訓上來的。爲容易明瞭起見，我們且先看各國歷史的教訓罷。

歷史是有兩面的：有縱面：有橫面。橫的一面，他有各種民衆運動事蹟。拿破崙的時代，在中歐各國有民族運動，在非洲有回民的宗教運動，同時在歐洲也發生經濟的鬥爭運動。到了現在，各國間的民族運動，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更是同時並起的普遍現象。這一切運動，實在都是民衆運動，因為運動之所以起，乃起於和多數民衆有關的問題，而其所有的目的，乃在解決民衆切身的苦痛。不過各國的民衆運動，有的是為經濟鬥爭，有的是為民權鬥爭，有的是為反抗外力壓迫的運動，而都是各為各的特殊問題而起，各依各的方式進行，而且各照各的預定主張而謀問題的解決，所以各種運動橫的一面沒有連屬，縱的一面沒有相同的步驟，結果往往沒有多大的成績。

從各國歷史上這種種民衆運動事實看來，無論那一個民族，它的問題，總括不外三類：一是屬於民族的問題，一是屬於民權的問題，一是屬於民生的問題。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所以有世界歷史的根據，所以備具了適用於世界的特長，都是為此。然而在過去歷史上，各國對於這三類的問題，都是遇着特殊的事故發生了之後，隨時來謀解決，沒有像孫先生這樣博大的眼光和精神，能預先為一個國家定出長治久安的大計畫來。所以各國解決這三類問題，各有各的歷史因緣

，而大抵都犯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毛病，結果連一個大問題都沒有解決。如果再把各國歷史縱的一面看來，我們更可以明白這三類的問題是不能各別的或任從一個來單獨的解決，同時也就可以明瞭我們的民衆運動，爲什麼要以三民主義爲基礎的道理。

英國在歷史因緣上是首先注重民權問題的一個最好的例證，從十四世紀起，英國的民衆運動，直可以說是由貴族僧侶反抗君權之爭，到中產階級反抗貴族僧侶的特權之爭，由中產階級反抗貴族僧侶的特權之爭，到近代平民選舉權之爭。英國民衆解決民權問題的方法，就是一貫的要求一個代議制度。他們的歷史彷彿告訴我們道：只要代議制度一鞏固，民權就可逐步的解放出來；只要民權問題有了解決，其他都不是根本問題了。固然，自從代議制度成立以來，英國誠然對於什麼問題似乎都能迎刃而解了。然而英國在歷史上曾經遇着一個宗教和政治相衝突的問題，他的代議民主制就經了百多年而找不出辦法。後來找着一個辦法，叫做『政教分離』，凡是宗教的信仰問題，任個人自由決擇，國家不去干涉，而個人就再也不必把教爭混入政爭。其實所謂『政教分離』，何嘗是什麼辦法？這不過把宗教之爭與政治之爭劈開，而宗教之爭這個問題仍還存在着。這是民權問題

解決而其他問題不能解決的一個證明。到了近代，社會經濟組織大變遷，代議民主制就更遇着困難。國會是要有大多數議員贊同一種政策，才能維持政府的，而議員却代表了許多不相同的經濟利益。要維持政府，代表各種不相同的經濟利益的議員，便不能不有種種隨時的新結合。議員一方面是和政黨有密切的關連，一方和社會經濟團體有密切的關連，他們的隨時結合，當然就是政黨和社會經濟團體的隨時結合。但這種種結合，又並非依照階級屬性爲標準的。譬如一個主張私有財產權的農民團體，事實上遇有必要，就不能不同一個反對私有財產權的工人團體聯合起來反對一個資本家的團體；這種結合，不適合於階級經濟的理論可知。即在勞工組合當中，雖然彼此都以同樣的社會主義原則爲基礎，而彼此間利益的衝突，往往比勞工和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劇烈的多。遇着保護政策提出到國會時候，棉紗業的工人和織布業的工人間，其鬥爭常常比棉紗工人和棉紗資本家之爭還更凶些。在這種經濟團體交相衝突的情況之下，英國的國會不啻分裂爲多少經濟利益互相水火的集團，誰也不能長久地聯合誰，誰也不能長久地分裂誰，但總是合不能好好地統治全國，分不能澈底地改革社會。所謂兩黨制，雖沒有完全僵死，可是代議民主制已不復有兩個以利害感情完全相同爲基礎的政黨來運用，而

有時時被多少利益衝突的經濟集團所拆裂的危機。代議民主制是從前許多人認為可以解決民權問題的，而英國又是代議制的祖國；他現在被事實證明，是以解決民權問題始，而將以不能解決經濟問題終。但是經濟問題是近代政治問題的中心，經濟問題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也當然不能解決。英國的民主，到了近百年來所以無進步，而只落得一個虛偽而不澈底的民主之批評，其原因就在此。依英國這個歷史的例，我們就可知凡是一個國家，要想單獨解決民權問題，而同時不想解決民生問題，是決不成功的。英國歷史是從民權問題着手的歷史，現在牠却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問題，而且不能澈底解決民權問題，這豈非民權問題和民生問題有連鎖關係的最大史例麼？

其次 有的國家，其歷史的發展，並非沿着一條解決民權問題的線索而來的，換言之，就是沒有民權發達史的因緣，而一到現在工業發達的時候，各種經濟團體的鬥爭便成了國家的最大問題。奧國就是這種國家的一個最好的例證。奧國各種經濟團體是有組織的，所以牠的民衆運動，顯著地是經濟的鬥爭運動。國中各種經濟團體的力量，是勢均力敵的，而在政爭上也就不相讓。不消說，奧國人民的政治生活，就是利害不同的經濟團體有組織的長期鬥爭。這種鬥爭，不但

資本家與資本家爭，并且勞動者與勞動者爭。因為經濟團體的分野，事實上并非依階級的差別而分，乃依各項工業相互的利害衝突而分，所以表現在政治上的分野，就更加複雜。一個經濟團體的主張和政策，不能強其他團體的贊同，國家就因之長在各團體相持不下之中，而陷於僵化的政局裏面。這種國家，當然是沒有敏活的進步，所以在國際上尤其要受英法意和國際聯盟的支配了。這一個例，就可以證明凡是一個國家，若任經濟的行程自然發展，到了階級之間不但有衝突，而且同一階級同一職業之間也有衝突的時候，不獨民生問題是不能解決，就是民族問題也無法解決；可知民生問題和民族問題也是互相連帶的，要解決這個，就決不能拋棄那個。

站在歷史的總樞紐上觀察現在的世界，我們可以說：一個國家，如果單獨把權給與人民，把富給與幾個資本家，這種國家是不能稱為民主的；一個國家，把富和權都只給與少數人，而大多數人却一無所有，這種國家是決不能存在的；如果少數國家，對內把政治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的爭端解決，對外却強人忍受政治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的壓迫，這種國家是世界和平的最大罪人。現在的世界現象，正是如此，可見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是今日世界的三個連環問題。將這三個連

環的問題縮小到一個人的生存上說，就是人不能有財產而無自治權，也不能有自治權而無財產權，更不能有自治權和財產權就自視若天之驕子，而施壓迫於他人。倡無治主義者，理想在於破個人之被治，而心裏何嘗否認個人之自治；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制者，理想在於破除支配他人之財產，而心裏何嘗否認財產之享用；主張國際主義者，理想在於破除統治他民族的強權，而心裏亦何嘗否認各民族之自治？苟明此義，則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實人類全體的問題，也就是個人的切身問題。在這三大問題不能同時解決的社會當中，個個人便都有發起或參加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的必要！

這是根據世界歷史的教訓所下的斷案，然而再看我們中國自己的實禍，這三個切身問題，尤其急迫多了。孫中山先生早已和我們說過：中國民族所有的禍害，一是受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一是受外國政治的壓迫，一是受外國經濟的壓迫。這三種壓迫，不是僅僅一小部分中國人受的，也不是一大部分中國人受的，而是全中國人受的。全中國人切身的三個大問題，就在此。我們受外國帝國主義這三種壓迫之外，再加上民心渙散，沒有抵抗強暴的團結和能力，是自己第一種積弱；帝政遺毒，流為軍閥，竊奪國家政權來塗炭生靈，而人民却不但不沒有管理

國家事業的權力，並且沒有抵抗軍閥的能力，是自己第二種積弱；機器發明了幾百年，而我們還是生產落後，天然的富藏，自己不知享用，而任人估取得去做吸收中國人血汗的資料，弄到一種全國皆窮的景況，是自己第三種積弱。這三種積弱是內部的，那三種壓迫是外來的。內外的禍害兩兩比合攏來，便成爲民族民權民生三個總問題。所以我們中國的需要是馬上就須得解決這三個總問題，否則，國要亡，種要滅，到了那時，四萬萬人是要同歸於盡，決不能倖免的。

但是我們要解決全國民衆人人有切身關係的三大問題，我們就決不能走各國歷史所走的路。照以前世界歷史所給與的教訓，我們不能像英國那樣只從解決民權問題入手，而不同時解決民族和民生問題；我們更不能像奧國那樣任個人資本生產制度自然的發展，結果就連社會國家都分裂成多少經濟的團體而長相衝突。我們的問題，須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在同一計畫中謀整個的解決：這就是說，我們中國民族的自救運動許有整個的解決三個問題的計畫做中心。整個的計畫是什麼，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作用，在於消滅中國外來的三種壓迫和內部的三種積弱。詳言之，民族主義，在打破外來的人口壓迫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而恢復中國民族獨立自由的地位和權能；民權主義，在打破帝國主

義和軍閥兩種政治的掠奪，而建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政事的一個國家，使人人都自保自養的能力和機會；民生主義，在打破帝國主義軍閥及其他特權者的剝削，而以國家的力量來扶植生產交通事業的發達，以滿足人民衣食住行的四大需要。孫先生的建國大綱，更把三民主義具體的表現出來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其次爲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其三爲民族，故對於國內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國際平等，國家獨立。』在這三民主義的具體方案之中，孫先生完全沒有爲什麼帝國主義軍閥官僚一類的特權階級預留餘地，而只有純粹的爲民衆的福利打算。所以三民主義，就其作用說，實在是唯民主主義：衣食住行的需要爲民而謀，政治知識和權能的需要爲民而謀，國際平等獨立地位的需要亦無不爲民而謀。我們民衆除了這三大需要而外，還有什麼更切身而更急迫的需要呢？我們四萬萬人所受的壓迫，可以總括在一句話裏面，就要受